



整治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是何信号

4月27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召开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这是近日多地召开会议，开展整治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专项行动的缩影。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4月中旬以来，江西赣州、西藏阿里地区、天津市，以及重庆市两江新区、江苏徐州市均召开会议，开展整治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孟涛分析称，整顿行业协会商会换届成为专项重点，这是因为今年是地方换届年，行业协会商会一般三五年一届，不少协会商会也处于换届期。

他提到，在行业协会商会换届期间，有人期望维持个人影响力，有人在换届期间谋求好位子。在各种需求之下，拉票贿选、暗箱操作、突击投票等乱象容易出现。人事问题非常敏感，对社团发展而言，整治换届乱象极有必要。

多地整治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

公开资料显示，除了江西赣州市南康区，西藏社会工作信息宣传中心曾发文介绍，4月中旬以来，西藏阿里地委社会工作部深入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4月22日，山东省泰安市委社会工作部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督导组到泰安市商务局就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整治工作开展中期督导。

在天津市，天津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和行业（综合）党委，与20余家逾期未换届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谈话，推动开展换届工作。

在重庆市，重庆市委机关刊物刊发的文章提到，两江新区深入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专项整治，共梳理出理事会逾期未换届等5类问题90个，所有问题于今年5月底前全部整改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与行业协会商会换届相关的会议，主题多与换届相关。某部委下属全国性社团中层干部李萌长期在社团组织工作，他提到，社团组织的乱象往往集中在换届期间爆发。

李萌表示，有领导干部退休后到社团组织工作，目的是希望继续发挥权力带来的影响力；也有的希望通过社团组织，将其过往积攒的资源、威望、影响力变现。

如今整顿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在李萌看来，这是要将出于公心、能够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领导选拔出来。

周鸿华长期在某行业协会工作，曾任该协会秘书长多年。他认为，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协会选人不考虑专业性、行业影响力，而考虑行政职位高低。由于协会主要领导不懂专业知识，仅靠行政权威管理行业协会，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周鸿华表示，在选拔行业协会副会长或副理事长时，一般会同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担任，然而有的协会要看候选人与协会主要领导的关系如何，关系好则更可能成为副会长或分支机构主任。

另外，他提到，有行业协会换届总是流于形式，看起来民主公开，实际上协会会员参与度不高。

释放何种信号？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多地专项整治行业协会商会换届乱象，这与中央纪委今年年初提出的重点反腐领域“学会协会”密切相关。

他认为，今年是地方换届年，许多行业协会商会处在换届期，行业协会商会主要领导往往具有在党政部门任职的经历。行业协会商会本身可能掌握一定的资源，有领导干部会把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个人“后花园”，维持退而不休的状态，因此对协会换届乱象整治确有必要。

庄德水提到，从内部原因看，有些行业协会商会存在管理不严，换届程序流于形式的现实情况，有些协会曾受部委管理，协会与部委脱钩之后，有的部委还要在人事上维持对协会的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政企桥梁，除了在换届方面存在乱象，还可能在企业排名、评奖、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甚至存在设立企业从事经营性工作的情况。

某全国性社团组织会员单位工作人员武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行业协会乱象并不鲜见，“某企业为在某项排名中居于前列，向某行业协会提供了800万元的赞助费，而往年该活动赞助费是50万元”。

他还称，“操纵排名仅是行业协会乱象的一种”，“有协会设立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经营，并为旗下参股企业站台，损害了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今年4月中旬，官方公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

文件提到加强换届乱象整治，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提名、审核、公示、监督、退出等制度，巩固拓展脱钩改革成果，持续深化登记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全面加强资产财务管理，从严管理行业协会商会设立企业，不得设立与会员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

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杜广普认为，这一改革意见旨在促使行业协会商会严守不与会员争利的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服务全体会员、维护行业整体利益的非营利社会团体，天然具备行业规则协调、行业信息归集的公共属性。若允许其设立与会员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将形成“规则制定者+市场竞争者”的双重身份冲突，依托掌握的会员商业信息、行业管理与规则话语权，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扭曲市场竞争机制。

他还提到，该规定以事前管控为抓手，从制度层面阻断行业协会商会由行业“裁判员”异化成为市场“运动员”的路径，切实维护了行业公平竞争环境与广大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外，对于官方出台的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文件，李萌认为这同样是为企业减负，官方打破协会对某些资源的垄断，让协会商会真正聚焦到主业、聚焦到服务，维护市场公平。（武力、李萌、周鸿华皆为化名）

世界杯，还能看到直播吗？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距离开幕，仅剩一个多月时间。多方信息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版权问题达成一致。

如果不能在北京时间6月12日世界杯开幕前以“极限操作”达成协议，那么中国球迷或许无缘在电视上看到世界杯足球赛的现场直播。

国际足联在5月4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已与全球超过175个地区的转播商达成协议，但中国大陆和印度两地的谈判仍在进行中，现阶段需保密。

在中国大陆地区，世界杯转播权的买方有且仅有央视。国家广电总局于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体育比赛电视报道和转播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表示，“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包括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包括预选赛），在我国境内的电视转播权统一由中央电视台负责谈判与购买，其他各电视台（包括有线广播电视台）不得直接购买。中央电视台在保证最大观众覆盖面的原则下，应就地方台的需要，通过协商转让特定区域内的转播权”。2016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

虽然世界杯版权费每届水涨船高，但央视从未中断引进。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2002年日韩、2006年德国两届世界杯，央视花费2400万美元购得转播权。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世界杯中国区转播权价格上涨3.79倍，至1.15亿美元。外界预计，央视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独家全媒体版权花费为3亿—4亿美元。

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恰恰是新赛制，需要就版权引进重新谈判，重签合同。

公开报道显示，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预期在全球收获40亿美元的版权费用。从国际足联的角度看，涨价不乏其理由。本届世界杯由32支球队扩军至48支球队，比赛场次由64场增至104场，赛事周期加长，涨价便随之而来。

加之，中国人口众多，球迷基数庞大，国际足联还将中国大陆与美国、英国同列为“一级市场”定价。

为了刺激各国招商，国际足联还在本届世界杯学习北美职业体育的“吸金模式”，每场比赛有“补水时间”并增设中场秀。这些环节可以为每家转播商增设10分钟左右的广告窗口。

多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已经将报价降至1.2亿至1.5亿美元，双方预期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相关知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谈判之所以僵持不下，根本原因还是溢价太高，高到了很难通过分销、招商回本的程度。